

上的压制性因素，或沦为政治权力重建社会控制的一种工具。

由社区建设达成社会建设

中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潘泽泉

对社会发展来说，社区建设是一个能够转化为在社区层次上寻求集体行动，自下而上推动社会建设的最有效的方法。社区建设控制着社会重建的过程，社区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已然成为现代社会建设的重要课题。从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的角度，依托并着眼于以社区建设和发展来谋求社会发展，并将社区建设和发展置于社会建设目标之中已日益成为人类共识，并形成新的世界趋势，以下拟就社区建设与社会建设之间的主要论域和话语实践展开论述。

第一，社区建设是推动社会建设的微观机制，是实现和推动社会发展项目的最有效途径。一方面，可以把社区建设看作是社会建设进社区，如一些宏观制度，如社会保障制度或社会福利制度落实到社区，这正是社会建设重心下移的突出表现。另一方面，微观的社区建设是宏观的社会建设的切入点和抓手，是推动社会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社区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基本空间，社区居民的生活需求和利益保障，往往需要通过社区的社会化服务和自我管理得以满足，或者通过社区组织向各级政府反映得以实现。从执政为民和社会控制的角度来看，把握了社区就在很大程度上把握了社会，可以说，社区建设是社会建设的微观机制。

社会建设和推动社会发展战略的基本任务就是推动社区建设，实现社区发展，即必须经由社区建设实现和推动社会发展战略，否则所有的社会发展项目注定就要失败。社会建设行动项目的推动需要以社区作为最基础的行动单元，经由社区建设得以推动。在社会发展项目中，如反贫困项目、邻里复兴战略、移民安置和接纳、再就业、创收计划、住房社区推动、城市贫困家庭发展计划、目标群体的工作、社会保障与福利工程等，如果不加强地方社区，鼓励社区在规划与维持其基础设施过程中参与并发挥更大作用，这些社会发展项目注定要失败，社会学家郑杭生认为，“社会建设、社区建设，正是为了在一个市场经济的陌生人世界里，构筑人际关系和谐的、互助合作的新的社会共同体，这个社会共同体，在宏观上叫做和谐社会，在微观上叫做和谐社区。微观的社区建设是宏观的和谐社会构建的切入点和抓手，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基础性工程。”

第二，在社会建设中，社区建设有利于消除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对立”，建立国家、市场以及公民社会结合在一

起的新型社会关系。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及政府如何进行管理的问题上，针对社会的过度原子化状态，提出了要建立合作包容型的新社会关系，即在尊重个人价值的基础上，倡导建立共同体意识，使每个人、每个团体都积极参与到社会之中。社区建设被整合在“公民社会问题”中，主张政府与公民重建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在大力发展社区建设与社区教育的基础上建立“新型民主国家”。社区建设的提出有助于避免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对立”，有助于建立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合作互动关系，培养公民精神，鼓励公民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发挥民间组织的主动性，使它们承担起更多的职能，参与政府的有关决策。社区建设中的广泛民主参与和互助合作，还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社会公正”和“改善一个街区的生活质量”，通过社区建设还可以培养、维护并发展公民精神与实现社会价值，社区建设同样可以通过培养社会成员彼此的信任与互惠创造社会资本。

可以说，以社区建设为技术性的手段，依托基层社区的崛起，通过政府的分权和授权，在基层社区中构造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作用的现代治理格局，已经成为一种全球化的趋势。吉登斯指出，在美国、英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地方进行的研究表明，至少在某些地区和某些背景中，一个公民的领域正在迅速兴起。某些老式的公民组织和公民活动可能已经失去了吸引力，但是，其他类型的社会共同力量正在取代着它们。关键在于要采取既有利于当地社区，又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方案来利用它们，从而使之服务于更为普遍的社会利益。

第三，在社会建设中，社区建设是实现社会整合和社会团结的最有效的途径。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过程就是社会各个部门合作、协商、融合的过程，也是共同精神和共同价值的培养过程，也是社会融合的过程。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在社会整合、社会正义、社会公平等社会发展理念的推动下，其发展理念从根本上发生了转变，社区建设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改变落后面貌，社区建设也不再是局限于落后国家的扶贫助弱工程或项目，而是实现社会和管理重建、实现社会整合和社会团结，推动社会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社区建设强调在全球化背景下社区团结的重要性。吉登斯认为，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使得“以社区为重点”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变得非常必要，面对“乡村社区和城市街道中团结感的弱化，居高不下的犯罪率以及婚姻家庭的解体，需要在这里提出来的问题不是关于社会正义，而是关于我们在传统与习惯已趋衰落之后应当怎样生活、如何重建社会团结以及如何对生态问题做出反应”。

“社区”不仅意味着重新找回已经失去的地方团结形式，它还是一种促进街道、城镇和更大范围的地方区域的社会和物质复苏的可行办法，社区建设必须重视支持网络、自助以及社会资本的培育，使这些因素成为促成低收入社区

经济复苏的重要资源。从社区的建设经验来看,社区建设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社区内部成员的生活质量,从而促进了社区内部的团结。

第四,社区建设是重建人文精神、重建道德方案和实现以人为本发展战略的行动基础和基础单元。现代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温情和人文精神的缺失,带来了过度个人主义、理性主义的危害。城市化进程又加速了彼此陌生的人定居在偶尔相遇的聚居地,都市生活的“视若陌生人的技艺”虽能让每个人和谐相处,但这种温情的失落冷冰成为成年人交往的障碍。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受现代主义理性牢笼的控制,现代主义盛行的是一种现代都市生活,盛行的是一种消解道德情感、崇尚理性的生活方式,这种理性主义牢笼又会不断强化对道德情感世界和精神生活的禁锢,大众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又变得疏离化,出现人际关系淡化,责任心的道德沦丧。

社区建设被视为恢复个人自由、重建人文精神和社会道德方案的基础。社会学家塞尔兹尼克认为:社区主义并不拒绝自由主义理念,它力图重建自由主义,减少过度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危害,鼓励责任心的道德。社区主义的共同信念是“必须以社区主义的观念来影响我们时代重大的道德、法律和社会问题”。因为,无节制的贪婪、无根的心态、自我为中心、脱离社区和社会资本下降,让这些人忧心忡忡。社区主义的指导原则是权利与责任,也就是既不忽视个人的权利,也强调个人对社区和社会的责任。社区主义的核心观点是反对贪婪、以自我为中心、脱离社区,呼吁重建社区集体主义精神、维护社区和社会的共同秩序,促进社会资本的发展。

第五,社区建设是消除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平等并解决相关的一系列现代社会问题、实现社会稳定的最有效的手段。现代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公民素质衰落、贫富分化日益加剧、社会不平等日趋严重、人口老龄化、环境污染、住房匮乏、交通拥挤等问题以及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吉登斯提出: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加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公民素质衰落体现在当代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它并不单纯是保守主义政治家的一种杜撰。它表现为乡村社区和城市街道中团结感的弱化,居高不下的犯罪率以及婚姻和家庭的解体。而且他认识到,像老左派那样仅从经济上,或像新自由主义者那样放弃国家干预,“公民素质的衰落”都是无法解决的,“贫富差距将会继续扩大”。吉登斯企图通过社区建设这条途径来尽可能地缓解贫富的分化和社会的不平等,并解决相关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社区这一主题是新型政治的根本所在,面对诸如社区素质衰落、贫富差距继续扩大等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只有社区建设才能解决,社区建设不但意味着重新找回已经失去的地方团结形式。它还是一种促进街

道、城镇和更大范围的地方区域的社会和物质复苏的可行办法。

现代社会开始重视社区建设,其核心目的在于解决工业化、城市化所带来的社会发展问题。西方发达国家社区建设关注的重点由最初对经济目标的关注过渡到现在对社会目标的关注,许多社会学家及社会工作人员把复兴社区意识、推动社区建设看成是矫正那个时代的社会痼疾和其他许多弊端的极其重要的解毒剂。20世纪20~30年代,西方国家经历了大规模的城市改造过程,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现代化带来了许多问题,如人口老龄化、环境污染、住房匮乏、交通拥挤等问题以及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同时,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使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在文化、体育、社交、旅游以及商业、卫生、家庭服务等方面不断有新的需求出现。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许多国家开始把国家负担、高度集中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转向由政府和社会负担,分散于社区,形成小型、多样化的社会服务。20世纪中期以来世界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把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放在重要的位置,赋予社区建设以新的历史内容,诸如消除贫困、老年人抚养、禁止毒品、儿童照顾、种族融合等等,甚至包括在工业化达到新的历史阶段后的城市改造和居民住宅改造等等,都成为西方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人们看到,与城市化相伴随的社会问题不断涌现,比如城市暴力、贫民窟等,这些问题都是发生在城市社区内部,需要通过推动社区建设加以解决。

总之,社区建设是推动社会建设的微观机制和基础手段,是实现社会重建的最有效的方式,是消除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对立”,建立国家、市场以及公民社会结合在一起的新型社会关系的理想方式,是实现社会整合和社会团结、重建人文精神、重建道德方案和实现以人为本发展战略的基础,是消除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平等并解决相关的一系列现代社会问题、实现社会稳定的最有效的手段。

社会工作与社会建设

南京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讲师 沈 晖

1988年,在西方国家社会工作发展经历了百余年历史之后,我国开始了社会工作的恢复和重建。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社会工作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应市场转型、社会变迁的要求而产生,是中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一部分,具有非常明显的政府提倡、推动乃至建构的特色。由于它与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功能和意义不谋而合,又与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思路相互顺应,加之学